

# 历史的两重性

文 / 何兆武



## 何兆武

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等，口述《上学记》等。

近代西方思想在十八九世纪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以致于人们真诚地相信思辨理性和科学正在把人类带入一个地上的天堂。从孔多赛到斯宾赛都深信不疑并且期待着人类正在一往无前地而又义无反顾地渐入佳境。但是二十世纪的第一次大战粉碎了这种乐观主义的美妙梦想。恰好在这个关头问世的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与其说是一个历史哲学家的推论，倒不如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一曲感伤的挽歌。第一次大战后梁启超去了一趟欧洲，归来写了一篇《欧游心影录》，慨叹西欧的科学万能之迷梦的破产，是一篇对当时西方心态的写照，梁老先生不失为思想界一位感受敏锐的先行者。然而由于当时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落后了一步，她当时所需要的仍然是上一个世纪的思辨理性、民主和科学。于是，在随之而来的“科玄论战”中，宣扬生命哲学的张君劢就成了人人喊打的玄学鬼，诚可谓是有其宜也。

人类历史就是在二律背反之中前进的，古今中外都不例外，只不过中国比西方的调子慢了一拍而已。当时对西方来说，基督死去了，十九世纪天真而乐观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也死去了。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也日益褪色和淡出，似乎正让位于某些新的激情。自从现代化思潮步近代化思潮的后尘而来，在意识形态上就有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在哲学理论上分析学派、语言学派、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等各种新学说、新理论层出不穷，使人目不暇给，但又往往各领风骚三五年。它们的生命

力究竟如何，有的早已不过昙花一现，有的也尚待时间的考验，迄今似乎还没有可以比得上上述那几种近代思潮能够持续近一个世纪之久而深入人心。在这个从近代化到现代化转型期的思想状态中，有哪些是西方思想史所特有的现象，又有哪些是对全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这是一个尚待解答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历史哲学的问题，即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

如果人类的历史行程也遵循一条自然而又必然的规律，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可以解答的，是可以预见和预言的。如果人类的历史行程是人类自己所选择和所决定的，即人类自己是创造自己历史的主人，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无法回答也无法预见的。也许在这里，我们不妨同意历史具有其两重性的论点，即作为自然人，人的历史是服从自然的和必然的规律的，但作为自由和自律的人，他又自己的历史的主人，是由他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取向的。作为自然人，人对自己历史的所作所为不负任何责任，但同时人作为自己历史的主人，他却要对自己的历史负全部的责任。向何处去的问题，是要自己作出抉择的，历史哲学家或历史科学家是无法越俎代庖事先作出预言的。就前一方面而言，思辨理性(科学)就是必要的，是须臾不可离弃的。一些现代化的思想家们企图彻底否定科学思维，表面上是极端激进的，而实际上却使自己陷入了极端保守主义的立场，否定了任何进步的可能，所以事实上是倒退到前近代化的乃至史前的原始思维状态。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单靠思辨理性还是远远不够的，全部已往的历史和当代的历史都可以表明，人类并没有仅仅因为科学的进步，就能保证自己的生活更

美满、更幸福。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社会和美好的历史前景，并不仅仅有赖于我们必须是“能人”(homo faber)，还更赖于我们必须是“智人”(homo sapiens)，是真正有智慧的人。知识(Scientia 或科学)就是力量。但力量并不意味着就是美好和幸福，它也可以意味着是邪恶和灾难。人类掌握了核能就是一例。理想主义者不顾现实，每每流于空想和幻想，有时候直如梦呓；而现实主义者又每每缺乏理想，弥缝苟且，缺少为任何真正的美好和幸福所必需的崇高精神。思想总是行动的先导，衡量一家思想时，重要之点是要看它能否找到这二者之间最佳的结合。前不见古人，历史学不能复活古人；后不见来者，历史学也不能预示来者。读者们可以完全不必相信号称是历史学家们向我们大言不惭所宣示的种种过去和所预言的种种未来。但无论如何，前人的思想和行为、经验和教训总归对我们不失为一种启迪，使我们对世界对人生可以有更深的体会乃至智慧，也许这也不失为思想史的功用所在。

## 二

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说他的天国不是在这个世界。在这一点上，基督教颇有契于希腊的思想。从柏拉图起，希腊人就明确地划定了两个世界。完美的理念世界并不是、也不能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不完美的世界。这种两个世界的观念，似乎从不曾为中国的哲人所认可。中国的哲人只有一个世界。那就是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唯一的现实世界。他们的理想国就只能落实到这个现实世界，而不是在任何的彼岸或彼岸的任何地方——哪怕那是一个最能体现道体的“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国。当然，这个区分也不可绝对化。理想国在此岸迟迟不能实现，难免会令人失望；但是仅仅对彼岸的憧憬，又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于是我们就在历史上随时随地都看到有二者的交叉：即使在人欲横流的时代，我们也仍然看到有伟大的精神上的执著和追求，即使在无限崇拜和信仰的时代，也仍然看到有极端的不平等和人欲横流。这是古今中外莫不皆然的。能意识到这一点，就可以使我们对历史有更深切的体会。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以他们理性主义的思维构筑了一座天城，他们的天城正和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和观念一样，对人类的文化史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同时他们的局限也应该使今人引以为戒。一种理想被强调到极端、到绝对化，就要转化成自己的反面。博大转化为偏狭、自由

变成了专制，等等。我们今天应该警惕不要再犯历来思想家所轻易犯的那种错误，即以古波斯拜火教式的思维方式，要求思想上做到非此即彼、有或全无的清一色。一种理想必须在现实中是切实可行的。陈义过高甚而绝对化、但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付之于实践的理想，则结局就不免成为一场大言欺世的骗局。我们应该学会正视人的缺点和弱点，这可以提高我们的认识我们的境界；这也是一切时代的健全的精神文明之所必需。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怎样保持一种最佳状态的和谐，应该成为衡量一切思想体系的一条准则。

社会正义并不全是一句空话。历史上的历次革命并非是在物质生活最艰难困苦的时刻爆发，就是明证。极端狂热主义的统治，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是能持久的。过去和当代都曾经有过许多这样的时代，某些矛盾看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只剩下诉诸武力了，然而历史事实的演变却又往往并不如此。即如二十世纪中期的冷战和东西对峙，当时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唯有一场大战才是唯一的出路。然而一度仿佛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竟然转瞬之间可以化为过眼烟云而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而是转化为新的问题。假如当时按照某些极端分子的想法行事，那将不知为天下生灵造成多大的浩劫。这类浩劫在过去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以致于我们有理由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同时也就是是一部人类野蛮、愚蠢和残暴的历史。最文明的时代也可以同时是最野蛮、愚蠢和残暴的时代。

在另一个极端，则历史上总是有些乐观主义者天真地认为人性中所潜存的理性成分终将会逐步充分地发展出来，最后终于能克服一切阻力步入地上的天堂。果真如此的话，历史进入了近代和现代，就不应该有那么多惨痛的灾难了。人如果完全能听从思辨理性的引导，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战争。自古某些哲人们所相信的种种廉价的性善说和进化论，看来是毫无理论上的和事实上的根据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相反的观点——即人性是彻头彻尾的恶，所以人类社会和历史就必然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就是正确的。十八世纪对于启蒙和理性的天真信仰，今天已经成为往事了；十九世纪科学主义和实验主义的进步信念，今天也已经式微了。继此而后在现代化的西方，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层出不穷、纷然并陈，它们之中的某些科学成分将会不失其持久的价值，但其中不科学的成分却可能只不过是前一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的一种短期的反弹或反叛而已。

(原文选自199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何兆武——学术文化随笔》)